

党争与明清文学中的“壬辰倭乱”叙事 ——以沈惟敬等人为中心

万晴川

[摘要]明代文学对有关“壬辰倭乱”历史人物的描绘,受到党派之争、南北冲突和文武矛盾等因素的深刻渗透,使他们对援朝战争及其相关人物的评价出现巨大的分歧。这也是明中叶以来文学创作呈现出的重要特征之一。清代由于中日两国处于隔绝状态,且时过境迁,人们对“壬辰倭乱”的记忆已逐渐模糊,因而其书写以虚构为主,主要表达士人建功立业的梦想,与党争再无关系。

[关键词]壬辰倭乱;文学作品;人物形象;党争

1592年(明神宗万历二十年、日本后阳成天皇天正二十年、朝鲜李氏王朝宣祖二十五年)3月,日本关白(大将军)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企图假道朝鲜攻占中国,建立“大东亚帝国”。在朝鲜国王李昖的吁请下,明廷出兵东征,开赴朝鲜参战,中、朝军队联手,历时七载,终将日寇赶出朝鲜。对于这场战争,参战三国称谓不同,明王朝称“东征御倭援朝”,朝鲜称“壬辰·丁酉倭乱”(壬辰即为万历二十年即1592年,丁酉为万历二十五年即1597年),日本称“文禄·庆长之役”(文禄、庆长是日本后阳成天皇的年号)。援朝战争与宁夏之役、播州之役并称“万历三大征”,对参战三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历史走向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长期以来,“壬辰倭乱”都是相关国家文学艺术创作的热门题材,并随着时代变迁而赋予不同的义涵,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艺术的繁荣。然而,由于当时中、朝两国都存在激烈的党争,党争意识深刻渗透进“壬辰倭乱”的历史与文学建构中。本文就以“壬辰倭乱”中几个重要人物为例,讨论党争对文学人物形象塑造的影响。

一、沈惟敬

沈惟敬在史籍和文学中,皆是当时及后世最富于争议的人物之一。封贡失败后,沈惟敬被迫责论死。《明神宗实录》中说:“惟敬,市井无赖,非有忠信廉洁之行可倚”。^①甚至说他是汉奸:“沈惟敬,无籍棍徒,久通倭将。”^②胡应麟的笔记小说《甲乙剩言》中“沈惟敬”条,记沈惟敬与兵部尚书石星结识的经过,其中云:

沈惟敬以落魄乔寓燕中,寓傍有闲屋,使卖水担子沈嘉旺居之。嘉旺本乐清赵常吉家苍头,幼为倭奴所掠,载还日本凡十八载,泛海而还,还复走燕依赵,赵无所用之,故以卖水自给。惟敬暇则时时从嘉旺谈夷中情俗,虽器什乡语,无不了悉。会石大司马经略东事,而石宠姬之父袁某恒从惟敬游。惟敬日与袁言夷中事,若身至之者。袁以告石,石遂召与相见与语,大悦,遂奏受游击将军,奉使日本,而有封贡之说矣。惟敬妻姓陈名淡如,本故倡也。惟敬既远使,石每到门慰藉,至以沈夫人呼之,真可谓能下贱矣。^③

年龄稍小于胡应麟、并与胡应麟有通家之好的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有更详细的记载:

^①《明神宗实录》卷292,万历二十三年十二月癸亥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校印,1962年,第5419页。

^②《明神宗实录》卷308,万历二十五年三月癸巳条,第5749页。

^③胡应麟:《甲乙剩言》,《笔记小说大观》四编第6册,台北新兴书局有限公司1977年版,第3681页。

沈惟敬，浙之平湖人，本名家支属。少年曾从军，及见甲寅倭事。后贫落，入京师，好烧炼，与方士及无赖辈游。石司马妾父袁姓者，亦嗜炉火，因与沈善。会有温州人沈嘉旺，从倭逃归，自鬻于沈；或云漳洲人，实降日本，入寇被擒，脱狱，沈得之为更姓名。然莫能明也。嘉旺既习倭事，且云关白无他意，始求贡中国，为朝鲜所遏，以故举兵，不过折柬可致。致信其说，以闻之司马。惟敬时年已望七，长髯伟干，顾盼烨然，司马大喜，立题授神机三营游击将军，沈嘉旺亦拜指挥，与其类十余人充麾下，入日本。司马既以封贡事委之，言无不合，言路交攻，不为动。沈留釜山年余，廷遣制使二人往封，以惟敬为宣谕使，偕渡海。临淮李小侯既逃，朝命副使杨方亨充正，即以惟敬为副使代之。过海至山城州，草草毕封事。而倭留朝鲜者，终不去，贡事亦不成。石司马以违旨媚倭下狱，沈为督府邢司马捕至京论斩，妻子给功臣为奴。惟敬无子，妻为南妓陈淡如，少亦知名，时已老矣。沈诛后，部曲星散，淡如与嘉旺，俱不知所终。^①

由上记载可知，沈惟敬“本名家支属”，乃世家子弟，嘉靖时曾从军抗倭，后家道中落，流为下贱。因喜好炼丹烧汞，夤缘攀上兵部尚书石星，以游击将军衔参与明日和谈。沈德符嘉兴人，与沈惟敬算是同乡，但记沈惟敬抗倭事语焉不详，《天启平湖县志·沈坤传》可作为补充：

嘉靖间，（沈坤）以门户充役，集收银米。遇岁饥，死者相枕，坤悉散家貲并所收银米以疗饥民，官督之，茫无以应，甘罪狱中。会倭寇卒临鵪湖，总督胡公募勇敢之士，闻坤名，出狱留募下，议论颇当胡意。一日，倭战王江泾，我军失利，胡亦被围，坤子惟敬甫弱冠，单骑突围中，挟胡而出，胡益爱重坤。授职千总，部兵三千，父子设计，伪装犒军官，满载药酒，手执公文，经倭营而过，度倭追我将近，父子弃舟度水走。倭得酒，喜甚，争饮，而死者无算。^②

朝鲜文人申钦《天朝诏使将臣先后去来姓名。记自壬辰至庚子》中也有沈惟敬“用间谍鸩杀倭众”的记载。^③可知沈父沈坤是个勇于担当的豪侠之士，因散家财、擅自动用官米救济灾民而入狱，后经胡宗宪援救出狱，留置幕下。在王江泾之战中，沈惟敬曾单骑救出胡宗宪，父子俩又设计以毒酒毙敌无数，立有大功，只是这一功劳计在总督胡宗宪头上。绍兴人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卷之四“日本上”记沈惟敬封贡事云：

石司马惑于沈惟敬邪说，复使往倭营议封。惟敬奉部咨谒见经略于辽阳。应昌谓之曰：“倭求封贡，第宜卑辞向阙，何敢破朝鲜以要我？我奉命讨倭，惟知有战耳。汝往见倭，必求封贡者，宜尽还朝鲜一国，全军退釜山听命，具表称臣，我当为请。今议止退平壤，是以计缓我师也，有战而已！汝善保首领，无草草！”惟敬唯唯而去。应昌计倭自破朝鲜张甚，……会惟敬至自倭营，执议如初。应昌怒叱曰：“贼亡无日，何敢以谩词欺我？”喝令捆打一百，将遂诛之。提督、赞画以惟敬石司马所遣，杀之恐以不和败事，力为之请，乃弗杀。属提督拘于军中，择十六日誓

^①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7《兵部·沈惟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40页。

^②程楷、杨儒卿：《天启平湖县志》卷19《外志·丛记·沈坤》，上海图书馆藏，1627（天启七年）。

^③申钦：《象村稿》卷39，韩国古典综合数据库《韩国文集丛刊》第72册，第27页。

师渡江，颁示军律三十二条，一军肃然。^①

在诸葛元声的描述中，宋应昌是反对和谈的，沈惟敬负有全部责任。由此可见，在当时的正史、野史及笔记小说中，沈惟敬是个无赖的形象，而在其他诗文和通俗小说戏曲中，他又被描写成汉奸。如万历年间、嘉兴人李应征《釜山纪事》诗咏沈惟敬封贡之事，其中一首云：“持节不烦苏属国，和戎误听汉中行。遂令纶綍虚丹凤，翻引旌旗指玉狼。莫道朝鲜犹未靖，急将本算慎朝堂。”^②诗中“汉中行”即汉代的中行说，他原是宫中太监，汉文帝时与匈奴和亲，他作为随从护送公主到大漠。为报复汉廷，他投靠匈奴，为单于出谋划策，残害同胞。这里显然是隐射沈惟敬。大约成书于天启年间、署名四明山环溪渔父编的传奇《莲囊记》就明确把沈惟敬塑造成汉奸形象。该剧今失传，据读过该剧的董康介绍，大意写徐嘉与文娉有婚约，徐嘉有次酒醉得罪沈惟敬，惟敬衔恨而去。日本关白平秀吉侵朝，兵部尚书石星荐徐嘉为抗倭总帅，沈惟敬任翻译，他趁机破坏徐、文婚姻，向石星建议献美人文娉于关白，即可使其罢兵，石星惑其言。徐嘉得知消息，急率兵迎战，大败秀吉，擒惟敬，救回文娉。最后石星死于狱中，沈惟敬处斩，徐嘉封为靖海侯，奉旨完婚。董康疑剧中徐嘉指顾养谦，参谋杨元指赞画袁黄。但“养谦亦未能大败秀吉，石星亦未尝自将，皆缘饰，非实事。”^③其他人虽不能与历史上的人物一一对应，但沈惟敬却是实指的，他在和议时向秀吉敬献方物，欺君辱国，又挟私复仇，将个人恩怨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作者“四明山环溪渔父”有可能是宁波一带人。在明末清初小说《梼杌闲评》中，也有两处提到沈惟敬。第十二回写傅如玉对丈夫魏进忠与小人田尔耕交往愤恨不已，骂魏忠贤道：“你真是禽兽，不成人。我说你跟着田家畜生，断做不出好事来！那畜生，在京里跟石兵部同沈惟敬通番卖国，送了沈惟敬一家性命，连石兵部也死在他手里，他才逃到这里。”第二十四回描写田尔耕与沈惟敬相互勾结，“只因他与沈惟敬同恶，沈惟敬坏了事，他逃走在外。”这里把田尔耕石星和沈惟敬都说成是“通番卖国”，田尔耕更加奸险，害死石星和沈惟敬。《梼杌闲评》的作者很可能也是江浙人。

但至明末江苏人钱谦益笔下，沈惟敬的形象始有扭转。钱氏《东征二士录》与《按察公萧公墓志铭》二文，均表达过对沈惟敬的同情。《东征二士录》写援朝部队开拔时，袁黄将山阴人冯仲缨和吴江人金相罗致幕下。先是，“石司马所遣辩士沈惟敬三人入倭营，得其要领，行长许撤兵议封贡”，但仲缨指出李如松“恃宠桀骜”，不愿议和，“彼必诈惟敬，借封期以袭平壤，袭而不克则败军，袭而克则败封。”李如松攻下的平壤是座空城，行长已主动撤退，明军于是杀朝鲜人报捷。碧蹄馆之败后，明军与日军进入相持阶段，宋应昌命冯仲缨和金相前去与加藤清正谈判。仲缨以三寸不烂之舌，使清正退军。金相则击杀倭寇90余人，擒倭将一人而归。战后归国，二人不得叙功，终老北京。^④《按察公萧公墓志铭》则曰：“万历间，东师久不决，中外攘臂主战，以梗坏封议。而石司马所遣说士曰沈惟敬者，颇能得倭要领。我师老将骄，志不在战，阳欲杀惟敬以倾司马，而阴又欲委惟敬以弭倭。”最后感叹道：“嗟乎！惟敬法在必死。倭不退，固死；倭退，亦死。倭退而人知其出于惟敬，尤速死也。”^⑤可见，钱谦益暗中抨击了哪些

^①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中国野史集成》第27册，第61页。

^②朱彝尊：《明诗综》卷五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2页。

^③董康：《曲海总目提要》卷十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85页。

^④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二十五·杂文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806-809页。

^⑤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五十六“墓志铭七”，第1388页。

不愿抗战的高级将领，他们既想借杀沈惟敬以扳倒兵部尚书石星，又要利用沈惟敬去和谈。钱谦益不但肯定了沈惟敬说倭退敌之功，而且又塑造了另外两个“辩士”冯仲缨和金相的光辉形象。清康熙年间，嘉兴人盛枫编纂的《嘉禾征献录》卷四十《沈惟敬》，写李如松趁着沈惟敬偕朝使往封的时机，率军尾随其后袭击日寇，收复平壤，李如松“所部辽兵割丽人首以献功”。沈惟敬指责李如松破坏和谈，杀死已投降的敌人，“如松大恨”，未几，如松大败于碧蹄馆，又败于南原。这时，常熟人萧应宫以山东按察使监督朝鲜军务，命惟敬修书示关白，不数日，倭退，而劾惟敬者愈众，应宫力争之不得，卒论死。后东事平，有人议“惟敬宜无罪，至熹庙时，犹有称其者。”^①当时以南方势力以嘉兴人、赞画袁黄为代表，弹劾李如松杀鲜人冒功。盛枫将收复平壤、日军撤退归功于沈惟敬，与南派和主和派的观点完全相同，甚至粉饰沈惟敬之功。

那么，为何对沈惟敬的书写如此撕裂呢？这其实与晚明激烈的党争有关。开战前后，明廷内部存在“主和派”与“主战派”两派。据李光涛研究，壬辰战争期间明日和谈的支持者主要是内阁和兵部：“封贡一款，中朝论议不一，只王阁老（王锡爵）以为可许，石尚书（石星）、顾总督（顾养谦）亦皆主张”，“封贡，朝议不一，张阁老（张位）、李提督（李如松）、顾军门（顾养谦）等五六人，及户兵部，皆以许封贡为当，而其他科道等官以死争之”。^②石星聘任“市井无赖”沈惟敬担任谈判代表，“应昌师老无成功，亦愿弛责。然策倭多诈，恐兵撤变生。己而命沈惟敬复入倭营，促谢表，急图竣役”。^③宋应昌的赞画袁黄也附和他的观点，在《与见濮书》中曾说，“沈惟敬说倭不可全信，亦未必全虚。然郅生策行，则韩信无功，此诸将所以訛訛翕翕也。窃谓倭狡诈可以计取，难以力胜。”并举胡宗宪为例剿灭浙江全境倭寇为例。^④李如松原来主战，但“碧蹄大败，魄散胆破，乃始悚心，坚意惟封贡是图，不复言战斗事矣。”^⑤次辅张位是江西新建人，与赵志皋皆由申时行密荐入阁，“位与志皋相厚善”，^⑥他开始支持赵志皋，但后来与另一阁臣、浙江鄞县人沈一贯反对明日议和，主张对日作战，而当时的言官也主战。

万历二十二年（1594）五月，首辅王锡爵因“国本之争”事件辞职，赵志皋任首辅。史载赵志皋“柔而懦，为朝士所轻，诟评四起”。^⑦壬辰战争期间，兵部尚书石星力主义和，赵志皋“亦冀无事，相与应和”^⑧。万历二十二年（1594）九月十四日，赵志皋向万历皇帝上疏《答谕封事》，详细阐述对明日议和的看法，后来继续与石星一同推动议和之事。赵志皋和石星之所以主张和议，主要是认为明廷刚平宁夏内乱，财力和军力消耗很大，再与日寇打一场打仗力不从心；其次明军劳师远征，水土不便，粮饷匮乏，兵员不足。万历二十五年（1597）正月三

^①《松陵文献》卷六《袁黄》，吴江区档案馆（吴江区地方志办公室）编：《吴江人物水利合志》，广陵书社2023年版，第175页。

^②李光涛：《万历二十三年封日本国王丰臣秀吉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7年，第77页。

^③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二《援朝鲜》，第967页。

^④袁黄：《袁了凡文集》，线装书局2006年版，第1384页。

^⑤王德光：《目击东倭釁隙专备御疏》，吴亮《万历疏钞》，《四库禁书·史部》第60册，第53页。

^⑥张廷玉等：《明史》卷219《张位传》，第5778页。

^⑦张廷玉等：《明史》卷219《赵志皋传》，第5776页。

^⑧张廷玉等：《明史》卷219《赵志皋传》，第5775页。

十日，兵科署科事刑科左给事中徐成楚上疏弹劾石星和赵志皋在册封过程中通同欺蔽，赵志皋奏言：“东封一事，始于经略宋应昌之请，尚书石星许之，言官争之，事几成而欲败，赖圣断查究言官，而议论始息。倭使既至，破封不已，又值有李宗城私逃之事，议论更多，幸天威震怒，逮系宗城别遣杨方亨，而封事成矣。金日釜山之兵未撤，为索朝鲜之遣使，以致二使稽迟未还，谢恩夷使未至。然揆之事体，日本既退王京，又还王子、陪臣，则今日朝鲜亦宜遣使修睦，以释旧憾，乃成楚必欲兴兵动众，以开祸端，诚不知其何心也。”^①可见和谈也是神宗的旨意，赵志皋乞休时，神宗也亲口说：“封倭一事，原系本兵集议，朕心独断，有何欺误蒙蔽，不必深辩。”^②可见，当时主和派的阵势比较强大。

朝鲜人赵庆男《乱中杂录》载：“宋应昌、李如松，因沈惟敬与倭讲约许婚，欲以常家女代送。且奏天朝曰：‘倭奴已尽渡海，只有一二阵留在釜山，以待封王准贡之命。经乱之邦，士马难久留，请撤还辽阳，以待缓急。’”^③当时丰臣秀吉提出议和的七个条件，其中要求割让朝鲜土地和明廷和亲，沈惟敬等明知朝廷可能同意，却不加拒绝，而是两边隐瞒，企图挑选一个民间女子冒充大明公主蒙混过关，伪报日军已经尽数渡海撤回日本，只有一两支军队还留在釜山，等待明朝的封王准贡之命。沈惟敬甚至大胆伪造日方谢恩表文、乞天子处分朝鲜表文等文件。朝鲜方面当然反对和议，李朝陪臣黄慎秘密将册封不利的消息传回朝鲜，朝鲜接到他的情报后，立即派使臣前往明朝求救。万历二十五年（1597）正月二十五日和二月初五，朝鲜国王李昖两次报告日寇进攻，请求明军救援，明廷方知册封之事失败。同年二月初八，御史周孔教、黄纪贤弹劾石星及赵志皋欺君罔上。^④接着兵科左给事中徐成楚上疏弹劾赵志皋、石星。浙江道御史何尔健也上奏“奸辅误国，乞罢赵志皋。”^⑤三月，南京浙江道御史黄华秀等也上疏乞罢斥石星、赵志皋。^⑥赵志皋乞退，但皇帝均未准奏。万历二十五年（1597）六月，张位推荐邢玠为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统率数万大军，横跨鸭绿江，援朝抗倭。邢玠是主战派，他抵达朝鲜前线后，立即下令拘捕沈惟敬，杨元南原之战战败后，石星以欺君欺国罪被逮捕下狱，后石星瘐死狱中，沈惟敬坐大辟。赵志皋虽未受处罚，但卧病在家。赵志皋的思想偏向东林党，后来他的学生丁应泰诬告东征将士，邢玠为此与丁应泰发生激烈争论，称其为“和党”，揭露站在丁应泰背后的势力是“南人”。而且神宗发现受骗后，也转而支持与日寇再战。可见，当时的舆论对赵志皋、石星、宋应昌和沈惟敬极为不利。《甲乙剩言》中《赵相国》记胡应麟去看望病中的赵志皋：

赵相国以东事忧悴，时或兼旬不起，余往访之。适日者王生、医者李生两人在坐，相国谓王曰：“我仇忌何日出宫？”谓李曰：“我何日膏肓去体？”余笑曰：“使石尚书出京，便是仇忌出宫；沈游击去头，是膏肓去体。”相国为之默然。^⑦

赵志皋是浙江兰溪人，胡应麟则是金华人，两人交往较多，胡应麟颇为赵志皋所赏识。胡曾作《蟠桃歌为大学士赵公赋》，赞颂赵所建立的功业时，提到了

^①《明神宗实录》卷306，万历二十五年正月丙底条，第5729页。

^②《明神宗实录》卷297，万历二十四年五月丁丑条，第5556页。

^③赵庆男：《乱中杂录》，奎章阁藏本。

^④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451，《周中丞奏疏》，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957页

^⑤《明神宗实录》卷306，万历二十五年正月丙底条，第5730页

^⑥《明神宗实录》卷306，万历二十五年正月丙底条，第5744

^⑦胡应麟：《甲乙剩言》中《赵相国》，第3629页。

赵志皋在平定宁夏哮拜叛乱和援朝之战役甚至日本祈封等事件中所建立的功勋。所以胡应麟将封贡失败的责任推给石星和沈惟敬，当然，小说中对赵志皋仍不无揶揄之意。沈德符祖父与胡应麟父亲胡僖同为己未同年进士，两人对沈惟敬的看法也相似。《明神宗实录》前期由张惟贤、叶向高、刘一燝、韩爌、史继偕等东林党人主持编撰，后期还有顾秉谦、丁绍轼、黄立极、冯铨等阉党人物，编纂《万历疏钞》的吴亮是吴中行次子，也是站对东林党人的。在沈惟敬被处决后，主战派占据了上风，主和派赵志皋、石星、宋应昌受到指责，但以东林党人为主的主和派以及当时的浙江文人士大夫设法为赵志皋、宋应昌辩护，认为他们是受了沈惟敬的蛊惑，责任全在沈惟敬。钱谦益时是东林党党魁，曾与沈一贯争夺首辅而失败，所以，他站在“和党”的立场上，全盘否定援朝战绩，相信丁应泰的话，肯定沈惟敬的功劳。

二、宋应昌

宋应昌，字思文，别号桐冈，浙江仁和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进士。隆庆五年(1570)三月为户科给事中。石星曾一度想亲自赴朝御倭，在此想法破灭后，举荐了亲信宋应昌。原因有二：一宋应昌为兵部右侍郎，为自己身边的人，用起来得心应手；二是此时的内阁首辅王锡爵也举荐了宋应昌。石星与王锡爵并无政见冲突，在张居正专权时期，两人均上疏弹劾过张居正，加之此举也能缓和长久以来的阁部争端。而王锡爵举荐宋应昌则是由于两人同为南人籍官员，在地缘上具有亲密关系。宋应昌在被任命为经略之后，随即上奏神宗，希望任命出自于王锡爵门下的职方司主事袁黄、武库司主事刘黄裳为赞画，^①以此巴结王锡爵。此后，王锡爵由于母病回家侍奉，赵志皋随即入阁。而赵志皋与宋应昌为同乡，因而也不反对宋应昌出任经略一职。但宋应昌从没有边务经验，不懂军事，因而引起朝中不少人的反对。九月初九日，宋应昌“以被言，辞经略防倭之命”，但神宗“嘉其忠信任事，不宜困言自阻，不允辞”。^②御史郭实上疏再“论经略不可者七”，神宗依然支持，特下旨：“九卿科道官依违观望，不必会议。郭实逞私阻挠，降极边杂职用，再有渎扰并究。”^③而提督李如松是身经百战、久经沙场的老将，又刚平定宁夏之叛归来，却受一个外行节制，自然不服。《明史》中云“如松新立功，气益骄，与经略宋应昌不相下。”^④他对朝鲜通译洪纯彦直言：“武官受制于人，而不能自擅”^⑤。当时，援朝的将官和士兵中，主要由南方抽调的原来由戚继光率领的部队和李如松属下的辽东士兵组成，南兵服膺宋应昌，北兵则受命于李如松，宋、李不和，由此酿成南北兵不睦。明军攻打平壤时，李如松大呼“先登城者，赏银五千”，南兵诸将奋勇争先，首先登上城墙，拔掉日军旗帜，但在叙功时，李如松却将首功归于北军将领张世爵，遂使矛盾激化，引起南兵不平，散布“提督攻平壤时，多取朝鲜人民，削发斩级，以为贼首”的流言，^⑥使李如松遭到弹劾。

^①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卷1，《初奉经略请救疏》，吴丰培主编：《壬辰之役史料汇辑》上，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73页。

^②《明神宗实录》卷272，神宗二十年九月乙丑，第4692页。

^③《明神宗实录》卷272，神宗二十年九月辛未，第4694页。

^④张廷玉：《明史》卷二三八《李成梁传·附子如松传》，第6193页。

^⑤《朝鲜宣宗实录》卷36，宣祖二十六南三月己卯。《朝鲜王朝实录》第21册，第672页。

^⑥《朝鲜宣宗实录》卷37，宣祖二十六南四乙巳。《朝鲜王朝实录》第21册，第691页。

次辅张位对宋应昌出任经略有所不悦，认为出兵之事应缓办。当宋应昌赴辽东后，开始结好辽东巡抚郝杰，他对郝杰说：“囊张相公曾有书见示，谓征倭一事未宜轻举，此至教也……故今日之师，实万不得已也。老公祖如有书致政府，幸以彼意达焉，庶不佞之领受深，而为情最苦也。”^①希望郝杰居间调和。

兵科给事中张辅之弹劾宋应昌“愚笨”，听信沈惟敬之言，石星马上为其辩驳，称宋应昌此举为“恢复朝鲜之故……无嫌诈计”。^②张辅之再次上疏，言“此皆沈惟敬其说以误应昌，而应昌复溺其说以误阁部，石星素号忠诚，不加深察而谬误”。^③张辅之与袁黄、刘黄裳同为王锡爵所选拔，王锡爵在任时他不敢攻击，致仕后，对于王锡爵及其门生的弹劾便铺天盖地的袭来，张辅之还将罪责归于沈惟敬一人，认为宋应昌欺骗，而石星又受宋应昌迷惑。但广州道御史杨一鹏将主和派一网打尽：“宋应昌、石星、顾养谦、刘黄裳争相欺罔，乞下法司速鞠，分别典型。”^④河南道御史周孔教上疏：“若星执迷不悟，刚愎自用，仰鼻息于马上之口，敝笔舌于鼠首之间，因循误国”；又弹劾赵志皋“不惟宗社大计，曲昵私交，引用同乡宋应昌几败，乃公争。”^⑤这些弹劾文皆从侧面表示出赵志皋对宋应昌的态度。将矛头直指兵部尚书石星和内阁首辅赵志皋。内阁不断被言官弹劾之际，内部又开始分化。对于“封贡”问题上，张位与沈一贯持反对意见，而赵志皋与兵部石星又都主张“封贡”。总兵麻贵曾一日连胜十一次，本可乘胜进占釜山城，但此时主战派李如栢还未至战场，因而张位和沈一贯授意辽阳巡抚杨镐不予追击。但当李如栢到达前线之时，倭寇已经获得了充足的时间调整，大败明军。而后，此事被赞画丁应泰揭发，杨镐和张位受罚，沈一贯未受处置。后来沈一贯进行反扑，肆意弹劾丁应泰，此后“志皋每被言，辄疏辨求退”，^⑥不再进行辩驳，即使在封贡失败，石星死于狱中，张位因杨镐被贬谪，赵志皋也不再发声。

因此，在主战派笔下，宋应昌被丑化。沈德符《野获编·兵部·斩蛟记》：“关白之犯朝鲜，朝议倾国救之。时宋桐冈应昌以少司马督师专征，宋无闾望，能大言，次年将内计，有物色之者，因力任东事。”^⑦甚至听信术士，用鬼怪驱倭，甚至还令烧积草发烟以御倭奴：

宋相江（应昌）侍郎，经略朝鲜，命将士积草发烟，以御倭奴。众谓此等兵法，古不经见，冯开之先生云：“此法不载六韬三略，仅于《孟子》见之”。坐客骇问故，冯徐曰：“首篇即有之矣。不曰齐人伐（句）燕胜之乎？”一坐绝倒。^⑧

清初谈迁在《国榷》中写道：“应昌寡方略。其抚山东，行部登莱，征鸡子数万，谓掷倭舟不耐立。在辽阳，信方士沈君就语，垒几数丈，登之曰：‘三日后天兵十万灭倭矣。’”^⑨总之，当时的言官和舆论都嘲笑宋应昌没有威望，不懂军

^①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卷3，《报蓟辽郝总督书》，吴丰培主编：《壬辰之役史料汇编》上，第251页。

^②《明神宗实录》卷264，神宗二十一年九月戊辰。

^③《明神宗实录》卷264，神宗二十一年十月壬申，第4925-4926页。

^④《明神宗实录》卷272，神宗二十二年四月丙子，第5055页。

^⑤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451，《周中丞奏疏》，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957页。

^⑥张廷玉：《明史》卷219，《赵志皋传》，第3851页。

^⑦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七《斩蛟记》，第441页。

^⑧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四《兵法用烟》，第912页。

^⑨谈迁：《国榷》卷七十六，中华书局1958年年，4689页。

事。

但大部分浙江文人士大夫还是支持宋应昌的，出征伊始，嘉兴人李应征就作《闻王师东援朝鲜》道：

材官十万欲平倭，司马何如汉伏波。
杀气晓连玄兔郡，将军夜渡白狼河。
还须直破伊岐岛，莫使虚传杖杜歌。
礼乐东藩箕子国，王师急为洗干戈。^①

作者期望王师扫平倭寇，直捣倭寇老巢对马岛。袁黄《别石司马》第一首把石星比作龙，“白云如练绕长塘，东飞万里长随龙”，第三首比作伯乐“长辞伯乐泪沾襟”。^②宋应昌辞职家居，袁黄曾去拜访，作《访宋桐江》云“踌躇立尽寒梅影，只恐重飞六月霜。”^③对宋应昌受到的冤屈表示不满，并对未来的不乐观。湖州人茅坤赠宋应昌《倭寇之寇朝鲜也，天子命少司马宋桐岗公提兵经略，振旅还朝，予赋蛟人歌一首，以附古者凯歌之末云》诗道：

提戈十万赴朝鲜，万里铙歌奏凯旋。
金印左貂推上赏，锦衣世授赐中天。
近闻范蠡辞朱纛，独拥西施入画船。
不厌故人共万舞，洛神赋草献花前。^④

作者对宋应昌的东征战功以及功成身退，都是给予肯定和赞美的。

对于宋应昌在封贡失败中的责任，浙江人和宋应昌的朋友极力为他辩护。绍兴人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卷之四“日本上”说“石司马惑于沈惟敬邪说，复使往倭营议封。”应昌则反对和谈，说“我奉命讨倭，惟知有战耳。”斥责沈惟敬“今议止退平壤，是以计缓我师也，有战而已！汝善保首领，无草草！”后惟敬至自倭营，执议如初。应昌怒叱曰：“贼亡无日，何敢以谩词欺我？”喝令捆打一百，将欲诛之，提督、赞画以惟敬石司马所遣，杀之恐以不和败事，力为之请，乃令拘于军中，“择十六日誓师渡江，颁示军律三十二条，一军肃然。”^⑤可见，在诸葛元声笔下，宋应昌是坚定的主战派。黄汝亨《宋公行状》中对宋应昌更是多有肯定，说他早年即关心边事，有将才，在祖承训援军覆没后，“中外汹汹，计划无所出，朝廷悬赏格，有能复朝鲜者赏银万两，封伯爵，世袭。朝臣举股战，舌举兢兢无应者。”在这种情况下，宋应昌挺身而出，甫一上任，即申明军纪，周密部署，一军肃然，观者皆敛手惊叹曰：“宋公行兵整而暇，大而不疎，真经略也。”其中记阻止沈惟敬议和云：“石大司马(石星)又计且缓师，俟西事定，遣沈惟敬以封贡议往。有旨：惟敬以游击职衔，著经略军前听用。至是，道谒公，公呼惟敬前回倭，倭求封贡，第宜卑辞向阙，全军退釜山听命，何敢蹂朝鲜要我，而计缓我！我奉命讨贼，有战而已！汝毋以身尝法！惟敬缩舌去……会惟敬至自倭营，执款议如初。公瞋目大怒曰：‘天兵来如泰山压卵，贼亡无日，尚敢以谩词侮我，汝怯辱国，罪当斩。’命力士缚惟敬军中，而议讨贼益急。”与诸葛元声一样，《宋公行状》将宋描写成坚定的主战派，更论曰：“而议者犹以请封撤防为公

^①朱彝尊：《明诗综》卷五十七，第1123页。

^②袁黄：《袁了凡文集》，第1263页。

^③袁黄：《袁了凡文集》，第1285页。

^④茅坤：《茅坤集》下《耆年录》卷之四《倭寇之寇朝鲜也，天子命少司马宋桐岗公提兵经略，振旅还朝，予赋蛟人歌一首，以附古者凯歌之末云》，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2页。

^⑤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中国野史集成》第27册，第61页。

罪，不知公受命经略在二十年九月，而遣沈惟敬始封议入倭在二十年七月；继定封在二十三年秋，而公归田在二十二年春。则公于封事始终不涉。而部下撤防之议，自公得代后，公所留刘兵万六千，守全庆而争言不可撤。疏具在，则安得移而訾公！嗟乎！中山交趾之谤，古今同慨，奈何！”说宋应昌与封贡毫无关系。《宋公行状》又提到应昌以巫术退兵事，“时我寡敌众，军心惶惶，公指顾详暇，偶有能练神兵符术进者募，客相顾笑，以为诬妄。公曰：‘姑试之，借以安吾军。’公所秘造火箭、明火、毒火皆精入神，将士试之辄奇验，军心始安。”^①南军以戚继光训练的军队为主力，主要擅长火器，以巫术驱敌只是一种稳定军心的权术。黄汝亨乃江西进贤人，《明史》记载赓党给事中陈治推荐黄汝亨，^②“赓党”指朱赓一派，属浙党，可知黄汝亨在政治上是被归为浙党的，但黄汝亨并不是东林党的死敌，他曾为《东林十八高贤传》作序，序中对东林十八高贤的志节品行予以肯定。^③所以，他对宋应昌的评价，是站在主战的浙党立场上的，既有溢美嫌疑，又不乏客观公允的一面。宋懋澄《九籀集》中《东师野记》一文中记万历二十一年（1593）夏天，明军发生瘟疫，战马多死，宋应昌屯军平壤，假装派沈惟敬前往日军军营议贡，暗地里却向朝廷请增兵，神宗令刘綎率师五千为如松犄角。五月，日军退守王京，六道人马还釜山。六月，日军怀疑和约，复掠晋州。宋应昌遣李如松救援，并命沈惟敬责日军违约，并骗说若退回釜山，当褒封日本。日寇遂归还高丽世子及其俘虏，退西生浦。明军因资粮不继，欲议和，朝臣争议激烈，宋应昌请以百口保封夷无患。^④这篇文章当作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八月后、十二月前。宋懋澄华亭人，以节侠自许，当无诳言。按他的说法，沈惟敬议和是得到宋应昌指使的，但宋应昌只是做戏，其实是一种迷惑敌人的策略而已，但后来封贡他是支持的。这一说法应该比较符合实际，宋应昌是实用主义者，应依违于和战之间，有时借议和迷惑敌人，只是一个策略；有时则服从顶头上司赵志皋、石星的意志同意封贡。他与沈惟敬一起，为当时朝鲜国王李昫所痛恨，诸葛元声、黄汝亨以及现代历史学家、浙江富阳县城人缪凤林皆说“应昌自始主战，与封事始终不涉”，这不符合事实。

三、杨镐

杨镐，字京甫，河南归德府商丘县人。万历八年（1580）进士，累官右佥都御史。封贡失败后，朝鲜请援，大学士张位“力荐参政杨镐才，请付以朝鲜军务。镐遭父丧，又请夺情视事，且荐邢玠为总督。帝皆从之”^⑤。在大学士张位的举荐下，邢玠任总督，杨镐任经略。丁应泰，湖广武昌府江夏县人，官兵部主事。戊戌（1598）正月，以军门赞画前往朝鲜。浙江游击陈寅、中军周升因在岛山之战中失职，受到惩处，遂对杨镐怀恨在心。^⑥于是向丁应泰进谗言，丁应泰听信他们的诬告，1598年五月回到北京后，丁应泰上疏弹劾杨镐云：“东征赞画主事丁应泰奏‘贪滑丧师、酿乱权奸、结党欺君’。盖论辽东巡抚杨镐、总兵麻贵、副将李如梅等蔚山之败，亡失无算，隐漏不以实闻。而次辅张位、三辅沈一贯与镐

^①黄汝亨：《寓林集》卷十七《经略朝鲜蓟辽保定山东等处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宋公行状》，丁丙辑：《武林坊巷志》第17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5664页。

^②张廷玉：《明史》卷二百三十《汪若霖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026-6027页。

^③黄汝亨：《东林十八高贤传》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368册，第665页。

^④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五百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531页。

^⑤张廷玉：《明史》卷二一九《张位传》，第5778页。

^⑥孙卫国：《丁应泰弹劾事件与明清史籍之建构》，《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密书往来，交结欺弊也。”^①尽管总督邢玠及吴惟忠、茅国器、许国威等数十名将领上疏为杨镐辩护，朝鲜国王李昖也上陈情疏，但神宗没有采纳，《明史·张位传》记神宗怒对张位说：“镐由卿密揭屡荐，故夺哀授任。今乃朋欺隐慝，辱国损威，犹云无愧！”^②果然张位被夺职闲住，杨镐亦被撤职归国。赵志皋封贡事败后，被迫闲住达七月之久，忽回朝视事。丁应泰是赵志皋的门徒，他指使丁氏弹劾杨镐，意在排挤张位。封贡之议失败，沈惟敬被杀，石星被下狱，首辅赵志皋被迫闲住。朝鲜战事重起，在此情形下，张位举荐杨镐经理朝鲜军务，自然引起和党赵志皋的不满。杨镐自言：“天下大事，不知终竟何如也。赵阁老(赵志皋)，元来主封事之人，七个月被参告病在家，今忽出而视事。丁应泰乃赵阁老之相厚人，今欲构陷张阁老(张位)，又生出一番胡说。我之被诬，何足言也？”又预言：“天生沈惟敬，误了许多事，误了许多人。尔看今后，必有攻战不了事，羁縻为上策之论，纷然而起，军情动摇”。^③杨镐又对李德馨说：“内边论议大变，科官又上本参张阁老，本兵又上本参李如梅，群议纷纭。赵阁老乃主封误事之人。前日皇长子冠昏礼时。阁臣论议又不同，乘此机而纠结奸党腹心，必欲去张阁老，乃曰：‘误东事者，杨某也；错举杨某者，张某也。’阴嗾其类上本，而赵阁老从中票下圣旨，张阁老已不得安于其位矣。”因仰天叹曰：“外边有倭贼，内边有奸贼，贼党亦多，未知天下事何如云云。”^④果然赵志皋东山再起，仍坚持主和。这件事不但牵扯到内阁斗争，又与南兵与北兵不和有关，朝鲜国王李昖询问李德馨杨镐被参之原因，李德馨答道：“大概蔚山之役，南、北兵争功，情意乖戾，乃至于是也。”^⑤邢玠是山东人，杨镐是河南人，代表北方地主集团的利益，故对于北方将领李如梅等人更为亲近，对于南方将领有一定程度的疏远，因而引起南兵的不满。^⑥

主张和谈的东林党本来就反对援助朝鲜，他们基本全盘否定援朝战绩。熊明遇《日本》一文就批评援朝之战糜费金钱七百万，“竟不能得其要领，士马物故无算，朝鲜人复苦兵矣。至今有‘倭梳兵櫬之谣’，幸平秀吉病死，乃班师，朝鲜亦渐自为葆。”^⑦熊明遇是东林党人，在魏忠贤擅权期间，屡遭贬谪甚至流放，故反对援朝。更不幸的是，万历四十七年(1619)二月，杨镐以兵部右侍郎经略辽东，以十万余人分四路出师出击后金，在萨尔浒遭到伏击，全军覆没，崇祯二年(1629)，杨镐被处决。这更加影响了他在朝鲜的岛山之战评价，《明神宗实录》完全采纳丁应泰的说法，在叙述岛山之战时，补叙萨尔浒之战，一并否定岛山之战。后来清人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二《援朝鲜》继承《实录》的写法，全面否定援朝军队的战功。谈迁《国榷》、王鸿绪《明史稿》和清官修殿本《明史》皆沿袭《实录》的说法。因为明史修撰的话语权基本掌握在东林党人手中，同时又符合清初政治的需要，孙卫国指出：易代修史最关键的问题是塑造本朝的合法性，“建州女真正是在万历朝鲜之役期间崛起的，此后逐渐与明朝为敌。对于明朝在朝鲜战场上的战事，尽管与清朝并无直接关系，但随后不久正是在朝鲜战场上这支明朝军队，成为后金在辽东战场上的对手，故而清朝官方对于万历朝

^①《明神宗实录》卷三二三，万历二十六年六月丁巳，第5996页。

^②张廷玉：《明史》卷二一九《张位传》，第5778页。

^③《朝鲜宣祖实录》卷一〇一，宣祖三十一年六月癸酉，第23册，第450页。

^④《朝鲜宣祖实录》卷一〇一，宣祖三十一年六月乙亥，第23册，第451页。

^⑤《朝鲜宣祖实录》卷一〇一，宣祖三十一年六月丙子，第23册，第452页。

^⑥《朝鲜宣祖实录》卷一〇一，宣祖三十一年六月甲戌，第23册，第452页。

^⑦熊明遇：《文直行书诗文·文选卷十三》，清顺治十七年熊人霖刻本。

鲜之役明军先天上就有一种贬斥的心态。”^①东林党魁钱谦益选择相信丁应泰就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体现。

当然，丁应泰弹劾杨镐时，也有不同的声音，沈德符既肯定丁应泰“有才气能任事”，又批评他奏疏“丑诋东征诸文武，自邢昆田（玠）以下，无一得免。”抹杀东征将士的战功。^②后来丁竟坐贪墨罢官。清初人则比较倾向于同情杨镐，宋荦《筠廊偶笔》卷下记杨镐“战功卓著”，“军校有得罪于公者，诉赞画主事丁应泰，应泰雅不善于公，因上奏劾之。国中大夫士咸合词颂公冤。”杨镐被谗罢归后，朝鲜人思之，为建祠立碑，赋诗歌咏其事。^③清初佚名的传奇《铁弓缘》写冀州总兵祁飞龙之子启新欲强占瑞香和彩霞而不得，暗通关白，构陷瑞香之父匡镇。提督熊祥命匡忠和皇甫刚为左右先锋，歼灭倭寇，杀死关白，诸人封爵，有情人终成眷属。董康认为剧中祁飞龙似指赴日本和议时逃跑的正使李宗城，熊祥暗指杨镐，匡镇是袁黄。^④在这部传奇中，李宗城性格卑劣，而杨镐则是正面歌颂的形象。

结论

综上所述，明末清初的文学与史籍书写受到明代党争的深刻影响，无论是对援朝战争的战争的整体评价还是有关人物的历史定论，都体现出较大的撕裂，甚至截然相反。明代自中叶以后，政治斗争相当复杂，除党派之争外，还有文物矛盾，南北冲突，乡谊师生同门等种种因素，这使明代以之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呈现出相当复杂的面相，而涉及“壬辰倭乱”题材的文学作品就是其中典型。除上述提到的作品外，还有叙刘綎战功的夏氏传奇《大刀记》，已佚。渲染袁黄抗倭功绩的蒙春园主人《立命说》，今仅剩残卷。但清代由于中日两国都闭关锁国，基本处于隔绝状态，交流不多；加上清廷严禁结党营私，而且由于时过境迁，清人对“壬辰倭乱”的记忆已逐渐模糊，因而“壬辰倭乱”的文学书写逐渐转向虚构为主，主要借演绎才子平倭表现作者建功立业的梦想，比如明遗民陈枕的《水浒后传》、夏敬渠的《野叟曝言》、朱梅叔的《埋忧集》卷四《铁儿》都写到援朝史影，很少能从中看到明代党争的痕迹。

万晴川，原名万润保，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电话：15158132978

邮箱：wrb1963@126.com

^①孙卫国：《丁应泰弹劾事件与明清史籍之建构》，《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孙卫国：《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对万历朝鲜之役的历史书写》，《明清史研究》2019年第2期。

^②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七《日本》，第436页。

^③宋荦：《筠廊偶笔》卷下，《清代笔记小说大观》（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

^④董康：《曲海总目提要》卷三九，第1779页。
